

人工智能越来越火 请保持“正确姿势”

2017年两会正式开幕。而两会的“明星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也带来了自己的三个提案，这三个提案都和人工智能有关。

李彦宏说，百度人工智能将帮助解决走失儿童问题、缓解交通拥堵、构建国家创新型经济。今年两会提出的人工智能堪比工业革命，很多行业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需要对就业的改变做好准备，未来有可能出现1周工作4天的状况。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特别是当人工智能以AlphaGo、Master横扫人类顶尖围棋手这样一种对抗性、攻击性的面目为公众所了解时，科技发展太快甚至失控的担心又被周期性地激活。人们担心技术创新

引起机器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抢走一部分人的饭碗；害怕技术进步失去控制，使人物化，让劳动异化——《摩登时代》中查理的可怕遭遇让人难以释怀，科幻电影中失去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场景也经常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中。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自从认识到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后，人们同样周期性地焦虑技术发展太慢。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即是明证。面对质疑，他们总会说，知识的限制和内心的焦虑让人们倾向于夸大机器取代人类劳动力的程度，忽略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意想不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长期来看，技术发展带来了一个充满“廉价”商品的世界，资源获得的不平等现象将

会极大地减少，换句话说，虽然获益程度有大小，但大家其实都是绝对的受益者。

稍微留意一下政策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讨论不难发现，对技术进步太慢与太快的焦虑在当下其实同时存在。

每个焦虑者都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并共同去消除让他们产生焦虑的问题。但坦白说，恰恰是因为关于技术发展太快和太慢的焦虑同时存在，并且各方在焦虑的驱使下相互博弈、妥协，寻求可能的平衡，共同认识到作为一个共同体，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在创新和不创新之间做选择，而是如何把握好创新的方向和节奏，始终能够在张力平衡中保持一个与不确定相处、与创新同行的正确姿势。

《科技日报》2017.3.3文/卢阳旭

不知最近你有没有被一条“不同的爸妈，同一个朋友圈”的帖子刷屏？帖子直击一个目前堪称“普遍”的现象：某些社交圈已经成为伪科学传播的泛滥区。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伪科学、谣言“攻陷”我们的朋友圈呢？

别让伪科学攻陷朋友圈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第三人效果”理论，它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教授于1983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对“他者”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个体可能会认为有关新药的广告或者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的信息对其他人的影响要大于对自己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把认为对朋友圈的“他者”有重要影响的文章转发出去，但是往往很多内容都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论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亲人的微信群中经常会有人分享很多所谓“健康”的信息。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伪科学和谣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个体的“偷懒”习惯——我们在认知上的“吝啬”，会让我们通过捷径来处理信息。而这种认知捷径会受到先入为主的信息左右，如果起初我们接受的信息存在着偏差，那么后续改变这种态度和观点的难度就会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要注重科学传播的质量——这不仅包括科学性，还要和公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让科学更接地气。

有观点认为，科学传播有必要效仿市场营销的做法进行科学“营销”。只不过科学“营销”的目的，不仅要销售产品——普及知识，更多的是体现产品的价值和服务——让更多的人树立科学精神、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

今天，如何阻止伪科学“攻占”朋友圈，怎样让科学传播更有效力，这是所有人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光明日报》2017.3.2文/王大鹏

政协委员提出应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

我国癌症发病率接近世界水平，但死亡率高于世界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癌症发现较多处于中晚期。“我常呼吁常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把肿瘤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抗肿瘤蛋白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建议，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

多年致力于抗肿瘤研究的罗永章说，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90%以上，早诊早治已是国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很多发达国家从中受益。2017年美国癌症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多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

降25%，取得上述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及防癌体检。

癌症高发还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每年全国因肿瘤造成的门诊和住院花费远高于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和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费用，在广大农村，因癌致贫、因癌返贫现象普遍存在。如果能够通过正规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癌症，将癌症消灭在萌芽阶段，无疑可节约大量医疗开支。然而一些专家表示，由于我国目前癌症的诊断主要通过实验室免疫学酶学检测、影像学检测等，有些检查费用昂贵，常规体检无法普及，困难群体难以

承受。因此，罗永章认为，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是全面开展癌症筛查工作的有力保障。

罗永章建议，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引导扶持政策，将防癌体检与分级诊疗相结合，缓解医疗资源紧缺，增大人口覆盖比例。同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防癌体检方案，为不同年龄、职业人群安排有针对性的检测项目，规范检测内容及标准，建立居民防癌体检档案。还应分步实施，引导商业资本和保险业参与，促进医保防癌体检实现良性循环。

新华社 2017.3.3文/王博

新能源汽车缘何遭遇“滑铁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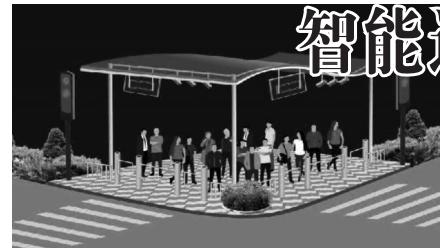
“新能源汽车销量下降与年初发布的‘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申报工作的通知’有很大关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示。

“通知”指出，2016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1至5批需重新核定。2016年前五批《目录》大致涉及新能源汽车企业235家，总共2193款车型都需要重新核定通过后才能进行销售，这需要很长的周期。车企一旦申请目录未通过，将面临产品拿不到补贴的风险。因此，车企还在等待新目录的发布。

在政策的变更和对于市场预期不确定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新能源汽车在2017年开局就进入“冰河时代”。“其他未录入的车型需要冒着拿不到补贴的风险销售推广，很多厂家现有的车型因为没有上目录而不敢卖。”许海东表示。

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叶盛基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汽车发展战略，是一定要推进向前的。在发展过程中，通过调整政策来调节产业发展，让产业更加成熟，包括产品、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成长。虽然1月的数据差一些，但是相信今年整体而言还是较好的，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70万辆到80万辆之间。”

《中国青年报》2017.3.2文/张真齐



近日，深圳交警在留仙小学附近的某红绿灯路口，试点了智能行人过街系统。系统由视频采集分析存储上传系统、控制器、显示屏、闸机、语音播报和前端计算机等系统组成。该系统充分结合现有的检测、控制、语音、人脸识别、自动抓拍报警、ITS等技术，在红灯亮起时，闸门关闭，将行人止步于闸门一侧；在绿灯亮起时，闸门打开，将行人安全放行。

必须承认的是，现代城市的交通进化史，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新技术工具

的不断研发与运用。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交通信号灯的大面积使用。故而，我们期待未来能够产生一套成熟的技术系统，从而彻底解决行人闯红灯的老问题——从此思路看，深圳交警如今的尝试，无疑值得认可。

倘若单纯从可行性角度分析，以智能过街系统来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其逻辑显然是成立的。但是，若是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就是另一回事了。试问，这套智能化系统，研发成本、量产成本、维护成本有多少？其所带来的交通秩序的改善效应，又能否匹配一系列的成本投入？即便是要治理行人闯红灯，也绝对是“不惜代价”。

深圳交警作为样品演示的这套智能过街系统，只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

选项之一。其能否真正推广使用，势必还要取决于一系列的必要性论证，以及公共财政的审慎权衡。而且，从本质上说“行人穿红灯”乃是属于素质和道德范畴的议题，动辄以技术工具介入矫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城市的管理者，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工具治理此类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失望与放弃，这显然有悖于公共管理者应有的伦理立场。

对工具理性和技术手段的过度迷信，长此以往，城市的治理成本势必越来越高，乃至陷入“用新工具解决新问题”路径依赖。当然了，深圳正在试水的智能过街系统未必就是这种套路化的工具，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谨慎地评估其功能和影响。

《江海晚报》2017.3.3文/然玉

“空巢青年”其实迟早要出现

“空巢青年”最近成为热议话题，据说规模已近2000万。这个群体远离故乡、亲人在大城市打拼，未婚单身没有家庭生活，独居让他们缺乏感情寄托。

虽然同为“空巢”，但与老年人在子女离开后的被动式“空巢”不同，“空巢青年”更多是自主性选择。拥有相对较高收入或容易从亲友那里获得支持，才使他们有能力独自购房或租房，享受“空巢”这种独处、私密的个性化环境。

只是“空巢”给人带来独处的自由和其他私密偏好的同时，也会带来孤独感。“空巢”拉开了群己距离，同

时也成为一种自我划定的牢笼。因此，“空巢青年”们往往需要面对暂时或长期脱离群体的寂寞感，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社会成本。

“空巢青年”现象有着社会转型的背景。初婚年龄推迟使大量青年处于单身状态，劳动力流动将已婚族类型化为迁移与留守的独处环境，家庭改变原来面貌而趋于多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强化了工作的专业性却淡化了集体协作性，这些都助长了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由“空巢青年”衍生的个体化趋势还会传染到整

个社会，比如在欧洲某些国家，大约1/4的人终身不会结婚。所以，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状态，甚至可能使“空巢”成为主要家庭类型。

这是快速转型中的社会的基本特征：转型越快，受转型不均衡性影响的群体越容易感受到压力，由此也增加了对社会的诉求。

既然“空巢”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居住安排，“空巢青年”们也释放出对社会的诉求，我们对家庭变迁背后社会建设意义的认知就需强化，以社区集体活动弥补这些人群流失的依赖感。只有在家庭和企业之外建立起繁荣的社区，才能将转型中的“空巢”者较好地整合进社会。

《环球时报》2017.3.4文/张翼